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三十七辑】

总主编：李玉明

马甫平 著

安志伟 著

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李方桂



李方桂，山西省晋阳县人，
1902年8月20日生于广州

作为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
李方桂从清华大学预科毕业后赴美求学，
四年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李方桂 / 马甫平, 安志伟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8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 李玉明主编. 第37辑)

ISBN 978-7-5457-0600-0

I. ①著… II. ①马… ②安… III. ①卫惠林 (1904~1992) — 生平事迹 ②李方桂 (1902~1987)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1 ②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305号

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李方桂

著 者: 马甫平 安志伟

责任编辑: 吕文玲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天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34.875

总 字 数: 700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版 次: 2012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600-0

总 定 价: 80.00元 (全套2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李立功 刘泽民 姚奠中 胡苏平 张平
张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贵卿	马志超	王克林	王志超	牛崇辉
田中仁	史耀清	任茂棠	刘在文	刘光彦
刘纬毅	邢利斌	齐荣晋	李东福	李尧
李秋喜	吴广隆	陈长禄	林玉平	杨子荣
杨建峰	张玉洁	张明亮	张国祥	张继红
张鸿仁	罗广德	郑建国	降大任	赵华山
赵望进	郭士星	郭维明	高专诚	高可
高海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崔元和
崔正森	翁小锦	梁俊明	储仲君	谢恺
董占锁	董瑞山	雷忠勤	潘孝忠	霍润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李玉明



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李方桂
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主编
降大任

目 录

CONTENTS

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引 子 01

- 一、游学日欧 才华初露…………… 1
- 二、学有所成 报效祖国…………… 5
- 三、投身抗战 倾心治学…………… 9
- 四、赴台著述 卓然名家……………12
- 五、晚年回归 欢晤亲朋……………16

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李方桂

引 子 **19**

一、书香门第·····	19
二、早年经历与求学生涯·····	21
三、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	25
四、归国之行·····	30
五、家庭生活与兴趣爱好·····	33
六、誉满中外·····	34

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引 子

卫惠林(1900—1992),山西省阳城县人,一代社会学宗师、国际著名教授、卓越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本文即对这位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及学术贡献作一简要介绍。

一、游学日欧 才华初露

卫惠林原名安仁,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十八日生于阳城县城内化源里尚朴巷卫氏故居。化源里卫氏,迁自通济里,为书香世家,其先世卫立鼎、卫昌绩、卫浚都诸公,皆清雅醇厚博学能文之士,道德文章,为人所称道。其祖父卫恭先、父亲卫金枢,皆乡里宿儒,平生设馆授徒,广施教泽,门人弟子遍城乡。兄体仁(字静臣,号净尘),弟敦仁(字愚山),均学有专长。

卫惠林自幼聪颖好学,家学渊源,更有父兄口传心授,得益颇深。宣统三年父丧时仅11岁,已能下笔成文,千言立就。1913年毕业于阳城县第一高等小学。1917年毕业于晋城濩泽中学。当时其兄卫体仁在阳城县城内创办乙种



工艺学校，聘惠林为教员，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工作。翌年，得知山西省官费留日预备学校招生，惠林随兄体仁赴并投考，双双考取。但体仁虑及家中上有寡母，下有弱弟，不能与惠林同时远涉重洋，便安置惠林入校安心学习，为留日打好基础，自己重返故园，再执教席，旋又考入山西法政专门学校。

1919年，卫惠林与同学王瑗（字昆生）、阎毓珍（字伯如）同行东渡。卫惠林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王考入帝国大学，阎考入庆应大学。1922年毕业后，王、阎二人随即回国任职，卫惠林又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社会哲学部修业2年。

1924年，卫惠林修学期满自日本回国，正值母丧，便回乡安葬。然后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发表了译著《伦理学》、《婚姻进化史》（民智书局出版）和《孔德的人文主义与女性崇拜》（1924年《晨报》）等论文。

1925年，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报考北京大学，在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即到上海就诊，养病期间，认识了卫惠林。他们一见如故，成为终生最好的朋友。卫惠林比巴金大4岁，他热情直爽，乐于助人，而且精通日语。巴金就搬来与他同住，向他学日语，并一起办刊物。但他们收入不多，生活过得很艰苦，经常以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应付一日三餐。卫惠林的周围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他和这些朋友，即真恒、吴健民、巴金、周索非、毛一波、姜仲因、卢剑波，秦抱朴等16人组织了民众社，并合作创办了《民众》半月刊，探

求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之路。

1926年秋，卫惠林怀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决定到法国去留学，并约巴金同行。1927年1月15日，卫惠林和巴金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昂热号”，经过36天的海上生活，终于到达巴黎。早已在巴黎就读的好友吴克刚（字君毅）为他们预订了旅馆，卫惠林和巴金同住在一间房子里。这是一个专供单身贫寒旅客住的地方，房间里装有煤气灶，可以自己烧饭吃。他们只要准备些固体酱油，买点洋山芋、洋葱之类的蔬菜，配着几片面包，就可度日。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卫惠林极重感情，与巴金和吴克刚朝夕相处，生活上同甘共苦，互相照顾。巴金身体不好，卫惠林和吴克刚对他更是体贴备至，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友爱。

卫惠林在巴黎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作为勤工俭学的《工余》杂志主编李卓吾、冯紫岗及其他许多留学生和工人。他们大都信奉无政府主义，而且有热情的向往。一到星期天，他们就来到卫惠林和巴金的房间里谈论时事。当时中国国内的北伐战争正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卫惠林感到无比兴奋，时事成了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一天晚上，卫惠林、吴克刚、巴金三人谈起当前的形势问题，意见逐渐发生了分歧，于是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不知不觉谈到午夜一点钟，以致受到法国邻居礼貌的干涉方才罢休。由于他们的观点未能统一，卫惠林提议写文章公开辩论，让大家去作判断。不久，他们把分别署名为卫惠林、蒂甘（巴金）、君毅（吴克刚）的三篇同题文章《无政府主义与实际



问题》寄到了上海《民钟》杂志编辑部，很快被印成小册子单独发行。卫惠林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论述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现在的问题绝不是国民党的政治方法或武装行动可以解决的，我们决不能介入到他们的行动里去。相反，我们应该去把革命色彩更浓化起来，更猛烈化起来。我们不但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还要去制止国内资本主义的发达，开辟一条人类完全解放的活路。自然我们的目的不会在短时间中完全达到，但我们还是要朝向我们的道路前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身居异国的卫惠林在 20 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对祖国革命的热情向往和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卫惠林读书非常用功，他先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科，1929 年又先后考取了巴黎人类学院和法兰西书院的研究生，他经常在图书馆内自学，贪婪地在知识海洋中探索，研读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他的学业，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法国留学期间，他深深地怀念远隔重洋的祖国，怀念别离已久的故园，怀念长眠地下的母亲和宽厚慈祥的长兄。他写出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母与子》，歌颂伟大的慈母之爱和亲密的手足之情，连载于上海的《时代前》杂志。这部小说，显露出了他非凡的文学才华。虽然他后来选择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不能否认他在艺术方面的天才和造诣。

二、学有所成 报效祖国

1930年，卫惠林结束了艰苦漫长的读书求学生活，回到了离别4年的祖国，开始迈入社会，准备踏踏实实做一番事业，实现他改造社会的宏愿。因为在他之前回国的吴克刚已在福建晋江（泉州）黎明高级中学任校长，聘他前来任教，这里聚集着陈范予、王鲁彦、丽尼、林憾庐和叶非英等一批淳朴热情、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年，他们都才30岁左右，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混世，想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用集体的远大理想教育下一代，把学校办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或者一个没有压迫的乐园。他们都为此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里，要建立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是根本不可能的。后来，吴克刚患了伤寒症，愈后应邀到河南百泉（今属辉县市）教书。卫惠林也在1931年年底应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助理研究员。

在南京，卫惠林认识了高宛玉女士。高宛玉（1903—1976），名琬，江苏武进人。父高敬轩，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国文教员，一生以读书教学为乐，承阳湖派之汉学传授，博学穷经，精研小学，而自甘隐晦，不求闻达；母赵氏出身常州名门，为状元赵忠毅公之后。宛玉16岁毕业于常州省立女师，与史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系同班同学。因连年军阀内战，曾立志终身不嫁，献身教育。先到乡下教小学，后到常州育德学校任主事兼主科教员，继又受聘任上海川沙懿光女学校长。由于国民政府的清党运动，风声鹤唳，



学校被迫停办。宛玉结束了她的十年教学生涯，准备进大学再度深造。曾到上海法政学院试读，因不喜法政而停学，又入金陵女子大学就读一年，因父母负担过重而自退。于是便改变主意入中央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同时学习图书馆学。1932年，卫惠林和高宛玉结婚。自此，高宛玉成了卫惠林生活上的忠实伴侣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她放弃了单独的自我表现，辞掉了图书馆的工作，倾注全力帮助卫惠林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高宛玉有良好的国学根底，卫惠林的每一篇言论文章，她都要一字一句的细心校读，而且要亲手抄写，对于文中的每一引证、每一资料，她都要认真查对，避免出错。卫惠林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是有高宛玉的一份心血在内的。

后来，卫惠林辞去了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的职务，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做兼任教授。当时的卫惠林，血气方刚，满脑子的理想主义，满腔改造社会的热情，还没有下定决心以做学问为终生事业。他常说：“书堆里并没有真正的学问，活的学问在社会里。”他认为趁年轻力壮之时，应该深入社会去体验，而不是埋在书堆里读死书。于是在暑期，他和宛玉随同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同学冯紫岗，到河南南阳去创办一所地方自治干部学校，想把自卫自治运动扩展到南阳全境，从自卫自治里，去实现平等自由社会。他们的学校在乡间的土墙茅舍里办了起来，招了生，由他赶编了社会常识补习课本，宛玉还计划办个妇女补习学校。正当此时，共产党的军队由鄂北进入南阳，胡宗南的中央军也尾追而入，地方局势异常紧张，学校无奈停办。他们

的这一次人生试探以失败而告终，同时也面临着失业的困难。于是他只好返回杭州，帮助一位朋友翻译《法国艺术史》。这时，正好中央大学一位教授有病，约他回中央大学代课，他和文学院长汪东以及徐悲鸿等知名教授住在一起，交情甚好。后来那位教授病好复课，他又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的农村教科教书，做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一学期后，正式受聘回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讲授民族学、社会思想史两门课。

1933年，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刊登完毕，第二部《雨》正在缪崇群主编的《文艺月刊》上刊登。小说的主人公吴仁民就是以卫惠林为原型塑造的，虽然小说中的情节并不全是卫惠林的亲身经历，但卫惠林热情直爽的性格完全可以是吴仁民的性格。巴金忠实地写了他最好的朋友卫惠林的为人。《雨》的前三章是巴金正为孤独黑暗所困惑，抱着十分恶劣的心情，在绝望的挣扎中写成的。当卫惠林在南京从《文艺月刊》上读到《雨》的前三章，立即给巴金写信说，你的小说“阴郁气太重，我很为你不安……我希望你多向光明方面追求吧！照你的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会写得更有力量，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继续或将有不利的影响……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无疑，这些话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和发展是有着正确启示的。

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办了中央大学的社会学系，系里的教授都另谋他就，各奔前程。卫惠林应聘到重庆的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授，教社



会学与社会调查课。他选定了酆都及境内的城隍山，作为社会风俗调查的对象，发表了学术专著《酆都宗教习俗调查》，用科学的观点剖析了传统的酆都鬼文化。同时社会现实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当时黑暗政治下的四川，整个是一半人一半鬼的社会，本来是天府之国，被清末官僚与民初军阀恶化成了地狱，即使把学校办好，也只是一小片绿洲，不解决根本问题。

1935年，卫惠林又回到南京，应聘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专任研究员，主持民族学与民族主义研究室。卫惠林和黄文山先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并担任执行副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还组建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先后由他担任执行理事、理事会主席。他自己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民族志》的初稿。发表了《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法则》（《人文科学》1935）、《法国大革命中的社会思想》（《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世界种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3）、《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4）等论文。

满怀着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的卫惠林，最终没有找到实现这种理想的必由之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持重起来，他将一腔热情寄托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且有了一定的建树，成为他辉煌一生的新开端。

三、投身抗战 倾心治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卫惠林举家辗转流亡到重庆。眼看战局旷日持久,他便将家人安顿好,作久居之计,自己则投笔从戎,束装乘舟东下,以赴国难。1938年3月,他来到抗战的中枢武汉,投身抗战大业。那里有国共两党及各党派的领袖,还有各界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卫惠林除担任边疆小组的工作外,还时常奉命去执行武汉地区的动员计划任务。他的工作紧张而忙碌,特别是武汉撤退前常在敌机轰炸警报中奔波,可谓是饱经风雨。1939年冬,卫惠林到桂林接受了到西北四省去做战时巡回教育与宣传工作的任务。他率领的团队要去的四个省区环境特殊,宁夏、青海是西北回教军人控制的地方,而绥远则迫近前线,是傅作义将军与日寇艰苦作战的狭窄地带,甘肃又有很大的东干回民居住区及临夏的回教区,开展巡回教育宣传工作异常艰难。卫惠林以坦诚、勤劳、公开的忘我精神,感化着他所带领的一批政工及艺术宣传干部,终于在1940年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到了重庆。

不久,卫惠林又奉命再赴西北,来到甘肃临洮一个新办的军事学校主持某部工作。临洮是唐代名将哥舒翰戍守西羌的重镇,在甘肃算是个文化古城,但实际上文化闭塞落后。那所军事学校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全无发展希望。更为失望的是学校的主管作威作福,贪污腐败,使卫惠林的工作很不顺心。他想这样陷在西北,与他原来参加抗战工作的目的背道而驰,连自己做人的操守也



将渐渐丧失。于是他三上辞呈求去，最后总算获准，离开了临洮。但是当他全家到达洮沙（今并入临洮县）县城时，城门突然被关上，他们被军车载回学校，说有要事相商。原来那位学校的主管，担心卫惠林到重庆后向上级汇报，攻击他的官僚作风。后颇经周折，才被放行。在临洮的经历和最后这场风波，使卫惠林看透了这些官僚政客的贪鄙意识和丑恶嘴脸，他决计弃绝政治，重新恢复读书教学的生活。这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抱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宗旨，潜心治学，逐渐进入学术生涯的佳境。

卫惠林做了历时三年半的战时政治工作，于1941年9月回到四川成都，当时成都已有四所大学，人才汇集。他在好友徐益棠的帮助下，到由南京迁来华西坝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授课之余，卫惠林开始整理他陆续收集起来的川康地区边疆民族的有关资料，并且创办了一种小型期刊《边疆研究通讯》，着重研究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后来几位有力者发起争夺文学院长的风波，而他只想保持洁身自爱的独立地位，结果凭空招来了许多流言蜚语，使他不得不拂袖而去。卫惠林就是这样，立身处世，于厚重中不存苟且，每至大义当前，为了保持人格操守，往往置利禄于不顾，宁愿忍痛失业，或者弃甘就苦而在所不惜。他生性淡泊，厌恶权势，从不肯为一己私利与人应酬敷衍，但与朋友和学生们却能相处无间。他潦倒半生，俯仰无愧，其高风亮节，有如此者。

1944年，他又到由上海迁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社

会学系任教授。已在复旦任教授的前辈好友马宗融夫妇听说他要来，便天天到岸上去等待瞭望。卫惠林一家不期而遇马氏夫妇，更是喜出望外，对复旦全没有了陌生之感。复旦的教授阵容比较强，研究风气很盛，虽然物质生活比成都更为艰苦，他却感到十分惬意。

1945年，由南京迁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创办了一个边政学系，特意聘请卫惠林去担任教授。暑期，他带着20多名高年级学生去青海作见习旅行，主要任务是练习少数民族语言。他到了西宁将学生分为3个语言学习小组，分别学习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安置妥当之后，还忙里偷闲到互助县的土人区做了一次为时两周的学术调查，很有收获，只可惜时间太短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卫惠林全家也随校东归。卫惠林还为国民政府民政部拟写了一套全国民俗调查方案，但国民党正忙于筹划内战，使这套调查方案未能实施。在研究民族学的业余时间，他又重译了早年崇拜的西方哲学家卢梭的《民约论》，1947年由作家书屋出版。

1948年，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的统治行将崩溃。中央大学的理工科教师还比较安静，等待着社会变革。政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惶惶不安，惧怕接受传闻中所谓“洗脑”改造的命运，纷纷讨论远走应变的计划。卫惠林是社会学教授，又是与政治无缘的自由思想者，自然属于后者。12月中旬，他全家跟随着前辈老友莫纪彭先生离开南京，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车开到上海真茹，卫惠林利用停车一



天的时间用电话跟上海的好友巴金联系，巴金立刻提了一罐酱菜前来送行。他们相对唏嘘，久久无言，直到开车时，巴金才依依不舍下车离去。大有“此番别后，后会难期”之感！这是卫惠林离开大陆前和好友巴金的最后一次见面。

到达广州的次日，卫惠林即被聘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广州 8 个月，生活极为艰苦。通货膨胀，米珠薪桂，甚至连寄一封信的钱也没有，有些教师在大门口公然摆地摊出卖衣物，以求一饱，而军警特务还常在夜半抓人，制造恐怖气氛。正当卫惠林一家面临绝境之时，他的好友何子星从台湾寄来了入境许可证，聘请他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参加编修台湾省通志稿。于是他们全家在 1949 年 8 月从广州出发，经高雄到达台北。

四、赴台著述 卓然名家

卫惠林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担任台湾省通志稿《同胄志》的主修。文献委员会的总编纂林熊祥先生让他的次子林衡立协助卫惠林工作。林衡立从小在日本读书，不会讲国语，卫惠林只好用日语和他交谈。他们一直合作无间，后来两人结伴调查达 20 年以上，成为莫逆之交。《同胄志》是台湾省通志稿中的台湾土著民族部分，在旧志中称为“番族志”或“番俗志”。日人在据台时期，曾从事实地调查，写出了《台湾番族调查报告书》。到了后期，更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对台湾土著各族的语言、神话作了学术研究，写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报告。但尚有不少风俗习惯